也谈中共的“气数”问题

芦笛

最近民朋返回本网站，就连麦卡徐先生也竟然忘记了他当初对全民作出“抵制海纳百川那共特基地，让其自动垮台”的神圣号召，腼颜在此在此现身，写出来的烂“文章”还进了导读，啧啧。

愚以为，没有什么事比这更能说明本网站不念旧恶的海洋胸襟了。不但对麦先生（麦卡先生？）那种十足纯金、如假包换的毛共余孽毫不歧视，就连对参与抢劫犯罪、颠覆本网站的罪犯贝苏尼、魏碑等人也不咎既往，这种事据我所知，还从没哪家网站作出来。

在此谨以资深网友之身，欢迎民朋们再度光临，只是请诸位向党卫军们学点文明作派，第一不要再忠实追随我党抓特务，以政治迫害弥补智力的贫乏。哪怕如哑太那样，改行研究网友硬度问题，似乎都要比这上流些；第二不要如什么“姗姗来迟”那样，胆敢要求网站剥夺党朋们的话语权。我对这两条的容忍度为零。如果诸位旧病复发，则我免不得又要大打出手，反正我早已向全网公告，本人乃中国共特党党魁，诸位毫无克制我的法宝，只有乖乖挨打的命。只要诸位做到这两条，则什么都好说，我看在网站面上，绝不会主动寻诸位晦气。

与此同时，还希望以阿随为代表的党朋们奋起反击，千万不要让“清流”们独霸了这家“舆论阵地”。

ＢＴＷ，阿随，我过去认为贵姐夫爆牙外长李肇星乃是国际社会第一痞子，前天看了电视，才知大谬不然。意大利总理谁谁（记不住那别扭名字了）最近公开澄清自己的政治言论，说，他没说中共是吃人魔鬼，说的乃是中国人把婴儿煮烂拿去作肥料。当下让我笑得在客厅里满地打滚，如同肾绞痛发作一般。我认为，凭此公这下子，就足可压倒咱们痞子外长以网战方式从事外交的伟大发明了，不知尊意如何？

看了万润南先生探讨“中共气数”问题的文章，很奇怪他为什么不来这儿注册上贴。和胡平、魏京生等同志一样，万先生似乎也是本坛的潜水者之一。只来此看帖却不作回报，是否有点自私之嫌？

细细，请万先生不必介意，我并不想把你拉下水，还是去干正经事为好。君不见那边的魏电工从此什么正事都干不了，全日制泡在网上？而且，网络非常凶险，不管你什么大人物下场，最后不可避免的结局就是失去神圣的光环，无一不以暴露智力或人格缺陷，毁了原来的光辉形像。像老芦这样熬下来的还真不多，还全靠我不怕凶神恶煞当网霸，这才没让人“摧毁”：))

还是来念正经吧。

一、“气数”到底是嘛玩意？

愚以为，万先生提出的问题本身的意义，似乎还没有这问题之所以会出现暴露出来的问题令人寻味。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人们会产生“为何共产党至今不倒”这种困惑？到底是什么人会有这种困惑？

窃以为，这种困惑之所以发生，恰说明了党宣传的威力。产生这种疑惑的同志，正是被我党改造得比较彻底的同志。这个困惑的潜在前提，乃是这么一个武断：

“凡是不得民心的政权，都必然要垮台。 共产党不得民心，所以共党必然垮台。”

稍知逻辑的同志都该看出，这是典型的演绎法三段论。头两句话分别为大小前提，最后一句话为结论。受过严格思维训练的同志，首先只会审视大小前提是否成立，然后才会考虑那结论。这对受过中学教育的同志来说，早就应该成为不假思索的剖析习惯了。

然而我们的同志却没有这种习惯，在他们看来，那大前提乃是天经地义，不容怀疑，小前提当然也成立，奇怪的是结论预言的事却迟迟没有发生。为了解释这咄咄咄怪事，他们便在无意识状态中修改了大前提，使之成为"凡是得不到正常人民拥护的政权都必然垮台"。换言之，原来那三段论只适用于正常人民。因为中国人民不正常，所以原来的预言未能发生。

就这样，积极分子们把中国人民开除出那"宇宙运行规律"之后，便不但成功地挽救了那"客观规律"，而且就此找到了弥补办法，那便是使用早在襁褓时代便从党妈妈那儿学来的《农夫和蛇》、《东郭先生和狼》，抛出"狼论"和"狗论"来，大骂人民是奴才，是狗，指望用这种"启蒙"把人民变成为自己争权夺利壮烈牺牲的"正常"炮灰。

其实，是成人都该知道，那大前提根本就不成立。我早在论述暴力革命的一系列经典著作中阐明了，暴力革命要发生，必须满足一系列必要条件，"失去民心"不过是其中比较次要的一条而已。而且，必要条件并非充分条件。即使所有的必要条件都满足了，还不一定会出现暴力革命。换言之，失去民心不一定会丧失政权，获得人民拥护的政权也不一定能存在。

粗知历史的同志都该知道这历史的真实：后梁开国君主朱温乃是不折不扣的禽兽，他登上大宝，究竟获得了谁的支持？明朝几百年下来就没出过一个好皇帝，那政权何以就是不倒？帝国主义分明代表了先进文明，一个效法西方模式的改良政权，当然比老佛爷的顽固朝廷更符合人民利益，为什么华北人民要起来作反动的义和团，专门和光绪爷过不去？中共政权从本质上来说远比国府反动一万倍，为何一个反动政权会取代进步政权出现？论残民程度，国民党拍马也追不着共产党，为何人民不痛恨共产党而痛恨国民党？论顽固不化、择恶固执，世上没有哪个政权比得上金家父子统治的北韩，为何人家就是傲然屹立不倒？如果美国不动用武力去强行推翻傻大木政权，伊拉克人民又有什么希望摆脱它？伊朗人民为何要去推翻开明的巴列维国王，迎来政教合一的远古式黑暗统治，而且这些年下来也同样巍然屹立，令美国又气又恨又无奈何？

所以，如果诸位不是让我党的"拜人民教"的迷魂汤灌得彻底丧失了原始神智，本该一眼就看出那个三段论不过是个惊天动地的弱智笑话。

这笑话我早在２０岁没出头就看穿了。记得那时偷读苏联出的《拿破仑传》，其中有件轶事令我终生难忘：拿破仑在当炮兵军官时亲眼目击暴民们围攻枫丹白露宫，羞辱威胁国王和王后。他大骂路易１６是个脓包，说只要调来一连士兵，打死几十个人，汹汹不可一世的暴民就会立刻如鸟兽散，跑得脚后跟朝前。此后他执政时果然如此，竟然使用大炮轰击示威民众，刹那间便收奇效，从此河清海晏，天下太平，再也没谁敢上街游行，"争取民主"了。

这其中反映出来的简单道理无非是以下这么几条：

１、人民和唆使他们的政客一样，都是怕死的。此乃人类天性，是基因决定的保存物种的基本手段，毫不可耻。胡平、曹长青、高寒诸先生自己怕死不想回国送命，也就无权剥夺人民怕死这条起码人权。允许人民怕死，应该是政客们首先必须具备的第一条良知。

２、如同士兵上阵前总是想着"打死的只会是别人，不会是我"一样，人民总是怀着侥幸心理才会参与闹事，他们的胆大是统治者纵容出来的，在闹事时，人民总是试着来。如果第一次没有遭到镇压，第二次参与的人也就越多，胆子也就越大，提出来的要求就更高，由此进入正反馈，整个８９学运的过程就是如此。反过来，如

果人民在事前就得知统治者必定要血腥镇压，则闹事根本也就不会发生。这就是暴力的威慑作用，如果暴力起不到维持统治的作用，那根本也就不会存在了。

３、在独裁国家中，统治者维持统治，靠的不是人民支持，而是枪杆子。在现代条件下，人民和枪杆子之间的对比，乃是肉和屠刀的关系。只有我党炮制出来的绝对白痴，才会指望精肉和肥膘们去打败镇关西郑大官人手中的屠刀。只有在郑大官人不敢使用屠刀时，精肉馅子们才会占上风。

４、因此，如无外力介入或致命内讧，旧政权被人民推翻，最主要的原因是统治者心慈手软，缺乏血腥镇压人民的魄力。如同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显示出来的那样，革命建立的新政权远比被推翻的旧政权敢于屠民，因而也就远比旧政权稳定。暴力革命起到的作用，就是用人工手段把心狠手辣的独裁者们筛选出来并送上大位。因此，经过一连串革命的国家诸如中国，统治者的凶暴便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

５、我党充分总结了国民党垮台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完全明白我上面讲的一系列简单道理。小平看中锦涛，正是因为后者敢于头戴钢盔，亲力亲为镇压西藏骚乱。这就是小平眼力过人之处。的确，对于中共来说，维持统治才是第一位大事，国家领袖是否具有敢于镇压人民的主观素质，远比他是否具有治国才干更重要。

正因为看明白了这点，我才敢断言，只要小胡执政一日，人民就不敢起来造反，中国也就绝不会陷入动乱。我劝民运同志们的招子还是放亮些，趁早少作春梦，从麦卡徐、高寒之类的“全民起义”幻觉中清醒过来。

明白了上面说的简单道理，就不难明白万先生说的“气数”到底是什么玩意，在毛主席著作学得最好、用得最活的民朋看来，那其实就是“人民支持”，而“气数已尽”其实就是指“失去了民心”。使用“气数”这种类似于“天命”的古代用语，说明在这些同志心目中，上面那根本无法成立的三段论确实已经成了“宇宙运行规律”。

这些同志犯的错误，乃是没有真正领会毛泽东思想的实质，只记住了表面上的简单教义，却忘记了伟大领袖一再重申的“决不可书生气十足”的谆谆告诫，更忽略了我党选拔干部的最主要标准便是“对敌斗争坚定”那一条。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党是怎么上台的，于是便以为可以应用党史教授的那套公式去取而代之。我党之所以造出这种画虎不成反类犬的积极分子们来，除了受教育者的天资问题外，其实还是我党无法把真话讲出来的结果。

其实，在我这 cynical 之人（这儿和不懂英文的同志解释一下，这就是为学毛著尖兵胡平同志谴责的万恶“犬儒”），所谓“气数”，可以用现代语言破译为“独裁统治集团敢于使用暴力镇压人民的主观意志和能力”。如果统治集团丧失了这种铁的意志，或是丧失了动用暴力的主观能力，则统治集团的“气数”也就尽了。反过来，如果统治集团具有镇压人民的铁的意志并能控制并投入镇压暴力，则他们的“气数”就如日中天。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敬爱的胡中央领导下的我党的“气数”正旺着呢。说出这大实话来扫诸位的兴，真对不起同志们了。不过我劝大家还是长大为好，老是以成人甚至老人之身冒充幼儿园大班的小宝宝，似乎也不是回事。所以，劝大家还是死心塌地，忘了充当新一代“民主”（亦即新一代人民之主）的美梦，准备客死异乡算了。当然，如果诸位要斩我这报坏消息的花刺子模国信使的脑壳，那也不必客气，只管挥刀过来便是。

明乎此，则不难看出万先生那“没有哪个敢于屠杀自己的青年的政权能长治久安”的话整个说反了。正因为我党敢于屠民，它才维持到了今天。万先生在作出那一般性结论来之前，怎么就不想想先去论证一番，回答“为什么敢于屠杀青年的政权必定会垮台”的问题呢？

二、什么样的人民支持？

前节贴出后，唐村先生诧道："老芦，你这不是回到狼羊律去了么？"的确，我说的简单道理，从表面上看来很像阿随那臭名昭著的狼羊律，更像他历来主张的"屠民治国论"。

勿过，这相似只是形似而已。阿随的"狼羊律"和我的"气数"论都指出，人民可以被独裁者任意屠宰，不过，他认为那是本该如此的天经地义，我则是无可奈何地作了事实陈述。类似地，他认为要治国就必须屠民，我只是告诉大家，他说出了我党心声，中共确实迷信"屠民治国论"，我党不是心慈手软的国民党，请大家停止做梦，以为可以用毛共上台前使用的那套"合法斗争"去斗倒中共。

最本质的区别还在于，如我早就指出的，阿随发扬中国传统，用不伦不类的文学比喻偷换逻辑论证，因而不但把独裁政权的特点强加到民主国家头上去，而且把统治者和人民说成是天生如此、不能转化的"狼"与"羊"，但就连绝对白痴都该知道历史上发生过多少次"狼羊转化"。就连毛共本身，过去又何尝不是"羊"？

其实，阿随提出的"狼羊律"，恰好暴露了独裁社会特有弊病。独裁社会把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天敌关系，在这种社会中永远存在着"羊"以暴力方式大规模转化为"狼"，向统治者们大举复仇的潜在可能，这潜在危险便成了一切独裁者们的永恒噩梦，构成了独裁社会特有的内部危机。

就连白痴也该看得出来，靠果敢屠杀人民，当然能维持独裁统治，但这只能是不得已之计。如果人民恨透了统治集团，那统治者就如同坐在不知何以爆发的火山口上，秦王朝的迅速覆灭就是生动例证。虽然科技进步使得人民失去了古代造反派的天然优势，但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险恶政治局面必然使得统治者疲于奔命，毫无安全感可言，必须把所有精力都用于密切监视镇压人民最微小异动之上，生怕一粒火星点燃燎原大火。这就不必要地增加了统治者的工作量，这种统治者当得很累很不潇洒，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下策。

这就是独裁制度相对于民主制度的最本质的"优势"——它没有民主社会那套解决社会危机、缓和阶级矛盾的设计，因此是世上最不稳定的国家。因此，世上只有独裁政府才会处于全民包围之中，不得不提出"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以小民为敌国，把"消除动乱苗子"当成政府的主要施政内容，把国家的大量资源用于监视镇压自己的人民，而民主国家根本就不存在这种特殊难题。

因此，全面地说，丧失人民支持当然不会造成政权垮台，但光靠镇压维持的独裁政权毫无稳定性可言，而是处于持续的危机状态。聪明的独裁者一定会尽量避免处于这种被动局面，代之以使用革命两手，主要靠软的那手来欺骗麻醉人民，骗取人民认同与支持，实在不行时才撕下面具，把硬的那手使出来。似乎可以说，如何巧妙使用软的那手，体现了独裁者的智力。

毛泽东的那手是把国家封闭起来，对人民实行分而治之，各个击破，使得人民永久处于互相暗算的内斗中。为此，毛赋予工农大众持续虐待迫害另一部份人民的特权，以此造成他们虚幻的"翻身解放感"，并时时用虚构出来的"变天噩梦"提醒他们过去和我党一起犯下的罪行，警告他们如果不效忠伟大领袖，一旦"还乡团"回来时，"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在设置内部假想敌的同时，毛还自绝于国际社会，设置了一系列的国外假想敌，有意将国家置于背水一战的绝望境地，以此保持"大救星"的地位。

这种土匪治国，古今中外历史上还见所未见，就连苏联都没使用过。它的工作前提是一个封闭而且持续处于紧张状态的社会，全社会从上到下都处于类似战前动员的高张力状态，使国家机器变成了《５７１工程纪要》说的"永动绞肉机"，势必不能持久。

后毛共部分继承了这套作法，继续利用"民族主义"唤起人民对政府的认同。不过，人民已经疲惫于无休止内斗造成的高度紧张，就连党国干部都受不了，邓小平不得不宣布停止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废除了毛设置的内部假想敌，改而寻求更聪明的欺骗方式，去最有效地换取人民支持。

于此便出现了万先生那问题引出来的第二个问题："什么样的人民支持？"

这本不该是个问题，可惜因为"民运"同志言必称"人民"，其实乃是天下最不懂人民是怎么回事的同志，所以这儿不得不再解释一下。

民朋和他们的党妈妈一模一样，越没有什么便越卖弄什么。"新"中国什么都是"人民"的：国家是"人民共和国"，钱是"人民币"，银行是"人民银行"，军队是"人民军队"，警察是"人民警察"，法院检察院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文革中就连"公共汽车"都改称"人民汽车"。奇怪的是，真正属于人民的唯一事物只有一样，那就是公共厕所，那是中华大地上唯一不实行阶级歧视和政见歧视、实行机会均等、费厄泼赖的为全民服务的重要机构（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收费厕所不计），可它偏偏是唯一未被称为"人民厕所"的机关。到现在我都不明白这历史性错误是怎么犯下的。

其实，我已经在《人民图腾》中说过，所谓"人民"，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神物。１３亿中国人，包括疯人院的疯子们，每个人都是人民。在本坛发言的所有同志，无论是民朋、党朋还是独知，统统都是人民。人民就是"庸众"的别称，不是神通广大、全知全能的上帝，不会创造奇迹。当人民大规模起来之时，倒的确能扭转历史发展方向，可惜往往是把国家扭转进深渊去。中国近现代史上发生的连续社会大跃退，从太平天国开始，历拳匪之乱，直到中共革命，无一不是如此发生的。

把平庸愚昧的"人民"莫名其妙神化为"上帝"，乃是毛共欺骗人民、夺取权力、维持统治的基本策略，与此同时，他们却又冒充"上帝"的解放者、教育者和代表者，并使用对敌斗争那套去对付自己的百姓，分化瓦解人民，挑拨煽动一部分人民去迫害一部分人民。

如民运垃圾们在网上生动展示的那样，他们把这两手忠实地学下来了。因此，鉴别伪民运的重要标准也就包括这两条，一是看他是否无耻吹捧人民并时时处处厚颜无耻地以人民代表自居，二是看他提倡的民主究竟是不是西式全民民主，是像西方政客那样，不但不敢以天然的人民领袖自居，更不敢教育人民，而是千方百计讨好选民，还是像毛共余孽胡平、徐水良、王希哲、高寒诸先生那样，动不动就以"民主"、"民师"身份出现，效法我党给大众下红头文件，今天发起这个那个运动，明天辱骂某部分人民是奴才和"犬儒"，后天企图改造人民的思想，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如果诸位见到这种拿着鸡毛当令箭的狂妄分子，那就一准是民运垃圾，啐他个满面花一定没错。

其实，"人民"是个大杂烩，从本身具有的能量来看，可以粗分为两大部分，其中一小撮称为"精英"，也就是知识分子，大部分乃是蠢人，也就是工农大众。在文明社会实行的脑体力劳动分工，决定了"高贵者最聪明，卑贱者最愚蠢"，无论是建设还是破坏（亦即造反），知识分子都起到大脑和神经的作用，而工农大众则是"瘦肉"，亦即社会的肱二头肌与股大肌。

没有知识分子充当大脑与神经的社会运动，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革命造反，都注定只会失败。在经济建设中，知识分子乃是设计者和指挥者，工农大众充当苦力，也就是影片《创业》上说的"知识分子画圈，工人打井"；没有知识分子画圈，则工人们便发梦也找不到哪儿有油田。在造反暴乱中，知识分子躲在安全的后方摇鹅毛扇，煽动、教唆、组织、指挥工农大众去当炮灰。没有知识分子摇鹅毛扇，则暴乱农民只会如陈胜吴广那样，把"首义"之功变成他人嫁衣。

正因为知识分子的能量不是一般的大，刘玄德才会为了招揽诸葛亮，不惜去装孙子，把远比他年轻的孔明同志顶到了头上去。的确，如果他没有招揽到孔明，早就在曹孟德过江之际授首了，哪还有后来三分天下的风光？孔明不献《隆中对》，老刘又怎么会有那战略眼光，想到必须避开实力雄厚的曹操与孙权，去捏软柿子，填补四川存在着的难得权力真空？

粗知中国历史的人不难看出，我这话完全是难听的大实话。一场农民暴乱是否最后会成功，关键的一条是它的

领袖是否如刘邦、朱元璋那样，礼贤下士，吸纳了大批读书人作军师，为他们出谋划策。事实上，历史上有点规模的农民暴乱领袖本人就是落第秀才，黄巢、洪秀全和毛泽东都如此。这些人因为过去受过主流社会排斥，得志之时其怨毒必然要以百倍疯狂发泄出来，乃是世上破坏能量最大的生物，超过一般文盲大老粗万倍。

建设又何尝不如此？中国现代史上的三次经济腾飞，每次都是知识分子主导的。第一次是国府１９２８－１９３７年的十年建国，因为蒋公实行了儒家的学者治国传统，使用海龟们作为经济发展的设计师，迎来了现代史上昙花一现的黄金时代。第二次则是５０年代按苏联专家治国的模式，搭建了基础工业的框架。第三次则是后毛时代的经济腾飞。这三次都是由知识分子主导的，因此都取得了成功。

反过来，在反右后，毛以为知识分子要造反，从此将他们入了另册，踢开他们干革命，马上就制造出“小土群”、“卫星田”的千古笑话来，让国民经济一头栽进了深渊，创造出在风调雨顺的太平年月几千万人民“非正常死亡”的奇迹来。光是这一奇迹，就说明了否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脑体力劳动分工的文明社会前提，弄假成真，真的相信了自己“卑贱者最聪明”的Ｐ话，会遭受到何等无情的惩罚。

那么，为什么东西方民主政客都要无耻吹捧人民，毛共更是把工农大众捧到了天上去呢？那道理很简单，西方政客需要选票，东方政客需要炮灰。光有大脑和神经，没有肌肉，则大脑们最好的前途也就是泡在玻璃罐里，去和好莱坞笑星马丁谈恋爱而已。因此，两者都必须甜言蜜语地去哄骗无知的工农大众，这就是政治的无耻处。只有老芦这种天生政治野心缺如（硬度不足的表现？）的毒蜘，才会为了保护肌肉们不至于沦为野心家大脑们的炮灰，把难堪的实话赤裸裸地说出来。

正因为此，聪明的独裁者都知道，所谓“获得人民支持”乃是句大而无当的空话，关键还在于“获得最有能量的那部分人民的支持”。人民中“最有能量的部分”当然是劳心者而非劳力者。获得了这部分人民的支持，就不但能有效地从事建设，而且也釜底抽薪，除去了最有能量的反对力量。

古人早就明白这道理了，所以李世民看到新考中的进士毕恭毕敬地进入皇宫朝见时，才会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如我在《中国ＡＢＣ：千年活化石》中指出的，传统中国社会之所以极度稳定，其中的一个关键措施就是它发明了牢笼知识分子的科举制度，用“政治六合彩”的巧妙设计，以潜在的、瞬息可获的功名利禄牢牢吸引住了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元朝没有实行这制度，所以很快就垮杆了。

细心审视科举制度的设计原理，可以看出它的高明之处就是费厄泼赖，亦即为全国读书人提供了一种机会均等的潜在成功可能。换言之，科举制度提供的不过是一种“公平的允诺”。其实，朝廷命官数量有限而且固定，根本无法赶上人口增长速度，由此造成的供大于求，使得大部分读书人终生都没有中举的希望，遑论考上进士。但因为竞争是公平的，实行了所谓“形式上的平等”，它便永远能吸引全国读书人前赴后继，终生溺此不拔，再不会想到造反作乱上头去。

由此可见，要牢笼人民中最有能量的那一部分人，关键在于为他们提供一种潜在的成功机会。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给出路”。如果独裁社会能为知识分子提供多种出路，那他们也就只会把脑筋动在如何利用社会提供的机会，改善自身待遇上去，不会再去琢磨怎样寻政府晦气。而这就是老邓在六四后做的事。

关于这一点，小鞍子已经在他的杰作里写得很明白了：８９年以后中国进入经济起飞，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发家致富的可能。他们的注意力焦点因此从政治上转移到了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务上去，普遍表现出了对政治的冷漠。

这就是胡平先生为何要在他那流芳百世的名作《精英与奴才》中破口大骂中国的精英们是“奴才”。他不愧是“民运”的“理论大拿”，看到了其他垃圾没能看到的事，那就是，本文第一节那个三段论的小前提“中共失去了民心”其实不准确。我党可能确实失去了工农大众的支持，但它却赢得了人民中最有能量的那部分人的支持。

这一历史性变化，在我看来，其实是难得的重大社会进步，是中国在折腾了这么多年后终于开始向常态社会转变的表现。社会应该为其成员提供多种实现自己抱负的出路，做到了这点的就是常态社会。反过来，如果知识分子什么出路都没有，改善自己的境遇的唯一希望就只在于推翻政府，那么这种社会就是病入膏肓的危险社会。它当然为在野野心家们提供了掌权机会，但我实在看不出来那对全民究竟有什么好处。

综上所述，我认为，中国现在的社会相当于８０年代而言，内部稳定性增加了，这是精英获得过去从未享有过的机遇造成的。这一变化乃是统治者和人民双方趋向成熟的表现，其实是一种历史进步，只对惟恐天下不乱的民运野心家不利。以胡平《精英与奴才》为代表的诅咒，只暴露了民运垃圾包藏着的毛泽东式祸心。如此而已。

三、为什么要推翻共产党？

国人常见的毛病，乃是把“理性决策”与“灵性信仰”混起来，其实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前者需要在事前仔细分析论证利弊，后者则根本不需要理性思考过程。

例如信教吧，是否入某种教，跟理性思辩没有什么相干。没谁是在博览群书、比较鉴别所有宗教、通过理性论证证明了某种宗教确实是真理之后，才决定入教的。相反，越是这么干，就越不可能信教，老芦就是这种人。绝大多数人决定加入某个教门，根本就不是什么理智决策，而是浊气一涌的结果。没有这股子浊气，您这辈子就没希望加入任何宗教。

这道理再简单不过：真正的理性思考的前提是“怀疑一切”，即不受任何既有的 presumption 的约束限制，而是认定任何声称在得到证明之前，都不能用作推理前提，因而去客观审视并无情剖析为一切大众普遍接受的“真理”，看它们到底是否成立。只有得到严格证明的声称才能用作推理依据。

但这种理性怀疑精神却与宗教精神格格不入，人家讲究的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根本就不容许您用怀疑态度去审查基本教义。就是容许也没用，宗教从来就是 beyond proof 的形而上玩意，用形而下的科学论证方式去解决超出人类理性能力的疑问，只会钻入死胡同。所以，理性思维成了人生习惯的同志，根本就不可能入教。

不仅如此，真正的教徒，讲究的是不计利害。如果您加入某种宗教乃是指望获得什么具体好处，或是藉此逃避灾难，那么，该宗教必然是法轮功那样的邪教。

这就是所谓信仰（belief)，它的特点是超越了理性论证与利弊分析，与理性说服无关，不讲究“充足理由律”。入教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强加于己，传教则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强加于人。

奇怪的是，在倒共同志那儿，“推翻共产党”似乎成了一种不容置疑的宗教信仰。他们不但自己不会想到“为什么要推翻共产党”这个问题，而且甚至不许别人产生这种疑问。

文明社会当然应该尊重宗教信仰。不过，文明人都知道，宗教是私人的事，政治才是大众的事。信仰只能留给自己，不能拿到公众场合来当论据，否则就是强暴他人自由意愿。过去法轮功的明心大仙就试图在这儿搞这一套中世纪勾当，将反对他的人一律打为只配销毁的魔鬼，最后碰得头破血流而逃。

既然“推翻共产党”不过是个决策问题，那就当然有“why”和“ how”的问题，“why”问的是“功利合理性与必要性”，也就是要求人们作出具有充分说服力的利弊分析。而“ how”涉及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可行性

问题。您先得解决了这可行性论证，这才能谈到具体该怎么去操作，是不是？

再说得明白些，倒共人士必须向大众证明以下几条：

１、推翻共产党是可行的。

２、推翻共产党是功利上的最佳决策，这是因为：

ａ、“推翻共党”乃是“人民普遍受益”的充分条件，换言之，共党一旦被推翻，人民就必将普遍获益，

ｂ、“推翻共党”乃是“人民普遍受益”的必要条件，换言之，不推翻共党，人民就不可能普遍获益。

ｃ、推翻共党不会造成重大的生命财产损失，人民即使付出代价，那也是利大于弊。

ｄ、推翻共党是一种事前可以精确计算、并在实施中得到严格控制的系统工程，绝不会像辛亥革命那样半道出错，不但没有达到原设计目的，反而使国家陷入长期动乱之中。

凡生活在西方的同志都该知道，所谓民主政治，就是人民根据自身的利害考虑，选举代表，通过辩论表决，去作出种种涉及全民利益的决策。推翻共产党乃是涉及全民身家性命的重大决策，任何公民都有权对持此种主张的政客提出以上最起码的咨询，而民运垃圾若想冒充民主政治家，就有不容推卸的义务，对这些咨询耐心作出详尽完备的解答。

因此，只有在雄辩证明推翻我党不但可行，而且是功利上的最佳决策，说服人民取得共识之后，“民主斗士”们才获得了宣传鼓动推翻共党的道义资格，才能去推行他们的暴力革命。否则就是强奸民意、一意孤行、视民命如草芥的孙中山、毛泽东式的大独裁者、大野心家。要这么干也成，那就直接打出毛泽东旗号来好了，拜托不要冒充西方民主政治家。

令人骇然的是，所谓“海外民运”到今天已经有２０多年历史了，但倒共专业人士们似乎从来就没谁涉及过这些最起码的问题。天下再没比这些饭桶更尸位素餐的专业人士了，这些人才是世上最该扫除的政治骗子寄生虫！

不仅如此，在上智如老芦者写出一系列批判伪民运力作，揭示了这一系列问题并给出自己的分析之后，某些下愚辈还要择愚而固执，写出愚不可及的烂“文章”来，认定“推翻共党”和“实现民主”一样，乃是一种必须不计一切世俗代价追求的神圣原则。谁胆敢偏离这道义立场，提出“共党骤然垮台会引起大规模内乱”、“暴力革命有可能触发核内战”的明智警告，就算不是帮助共党维持统治的帮凶，起码也是毫无原则的机会主义者！

光是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证明倒共人士特别是民运垃圾是何等轻藐民意、视国脉民命如儿戏，更是何等愚不可疗。他们的拿手好戏，不是像魏京生、曹长青那些文盲积极分子一般，使用文学比喻，把我党妖魔化为“大灰狼”，就是反复忆苦思甜，痛诉共匪滔天罪行，却蠢到不知道列举共党既往的滔天罪行，与证明“推翻共党不但可行而且应该”完全是两回事。

这道理哪怕是白痴都该明白：无论共党过去作了多少恶，将来还可能作多少恶，都不等于推翻了那个作恶累累的下流政权，就能保证人民境遇就此得到改善，而不是反而因此恶化了。如果中国人民早在４０年代明白这简单道理，也就不会热衷于拥护共党推翻国府了。因此，您要人民跟着您去推翻现有暴政，先得证明您的革命不会是中共革命那种“以强暴易弱暴”，让人民离开狼窝，却掉进了虎穴。

伪民运人士不敢正视上述问题，甚至禁止他人讨论这些问题，恐怕除了惊天动地的愚昧之外，尚有难言苦衷——一旦正视这些问题并找出可能性最大的答案来，则倒共也就无法再是一种职业了，岂不是要自动断了粮道？

其实我早就在旧作中多次分析过上述问题，再重复一次吧。

１、推翻共产党是可行的。

此乃绝对Ｐ话。我已经反复指出过了，在现代条件下，人民已经失去了以武力推翻共党的可能。共党无论如何倒行逆施，都不会被人民推翻。如果垮了，也只会是因为丧失了镇压人民的主观意志和能力所致。这点还要在本文第四节中详论。但在可预见的将来，我看不出人民有什么能力去推翻我党。既然是没有什么可行性的事，那还有什么谈论的必要？

因此，所有“销毁魔党”的噪音，都是哗众取宠，根本不值得任何成年人注意。老芦被这些蠢才连累得如此长篇大论，当真是天下第一倒霉之事。那目的不是为那些下愚疗愚，而是通过剖析这些病例，为大众演示一下什么才是合理的思维方式。

２ａ、“推翻共党”乃是“人民普遍受益”的充分条件，换言之，共党一旦被推翻，人民就必将普遍获益，

这是武断认定，根本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现有证据提示的完全是相反结局：推翻共党只会使得大多数人民遭殃。

有点人类常识的人都该知道，人民普遍受益的必要条件，乃是良好的社会秩序。胡平在“弱智语录集”《一面之词》中痛驳“相对于动乱来说，暴政似乎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批的其实是难堪的大实话。古人早就说过，“好死不如赖活”、“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安定的社会秩序乃是人民安居乐业的最起码前提。如果人民生命财产都得不到起码保证，谈何受益？

现在的问题是，共党骤然垮台，必然导致全国大乱。粗知政治学基本原理的人都该知道：中共是极权社会，没有缓和化解社会矛盾的基本设计，只会用高压手段将社会矛盾强行压下去，将社会危机积压储蓄下来。这种高压社会一旦失去控制乃是世上最可怕的事，由此骤然出现的权威真空必然使社会进入无政府状态。半世纪积累下来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党群矛盾等等就要以空前的烈度爆发出来，使得全国变成修罗场，过去的压力有多高，爆发也就有多猛烈。南斯拉夫就是榜样。

这就是我为何反复说，中共乃是中国历史上见所未见的最大的犯罪集团，但他们犯下的最大罪行，可能还不是在执政期间犯下的，而是因为他们实施高压统治，在身后给国家民族留下了最可怕的灾难。

因此，凡是神智正常的人都该看出来，共产党只能消亡，不能消灭或推翻。要使病态的高压社会转为健康的常态社会，必须有个逐步减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建立起足以取代共党的替代权威来。略去这个过程，轻率推翻共党，必然导致史无前例的灾难。

要避免出现这种乱局，前提是后继政权有足够的权威和实力去迅速接管，施加与共党相当的高压，镇住“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的暴民。请问，能取代中共的政治势力在哪儿？伪民运不过是一群小丑集群，唯一的本事就是内斗，连他们自己的队伍都没本事整合团结治理，遑论治理全国人民？还没掌权就营私自肥无所不为，一旦掌权，还不得因分赃不均，带头狗咬狗，咬出肠子来？

如今具有唯一的中央权威、纪律严明、具有战斗力的在野政治势力，只有法轮功一家，但现代国民（起码是知识分子们）绝无可能接受那政教合一的反动组织的统治。李教主的野心必将引起人民大规模反抗，此时因为共党垮台，人民获得了武装斗争的物质条件，接之而来的必然是全面内战。

就算这一切都不发生，伪民运和法轮功联手和平掌权，那也只会是再度出现社会大幅度倒退。

我早在《五论伪民运比现代中共更反动》的光辉系列文章中指出了，伪民运基本是毛共余孽，乃是现代中国最缺乏现代文明意识特别是民主法治意识的反动分子，是时代造就的“只红不专”的“专业运动员”，只会“抓革命”，不会“促生产”，毫无起码治国才干，唯一的学问就是效法毛共发红头文件，僭妄地给人民发号召，下指示，发动“反扫荡”之类的整人运动。其中最有“学问”的就是政治课教员胡平，而他除了冒充列宁毛泽东之类的“民主民师”，给人民开政治课，试图改造人民生活方式，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和道德修养之外，便什么治国眼光都没有，至今从未写过一篇像样的时事评论，表现出如老芦这种鞭辟入里地分析中外大事、并准确预言结局的远见卓识来。

法轮功那中世纪的邪教组织就更不用说了。如果那些人上台，那就是伊朗革命再现，乃是中国第二个太平天国。如果说伪民运与现代中共相比犹如毛共与国民党，那么法轮功与现代中共相比便如同发匪、拳匪与国民党相比。哪怕光是为了防止这些人上台，大众都得两害相权取其轻，拥护我党，绝不能给那些时代制造出来的野心勃勃的残次品以可趁之机。

２ｂ、“推翻共党”乃是“人民普遍受益”的必要条件，换言之，不推翻共党，人民就不可能普遍获益。

这已经为改革开放２０多年在中国发生的历史性巨变彻底证伪，不必再说。

３ｃ、推翻共党不会造成重大的生命财产损失，人民即使付出代价，那也是利大于弊。

我已经反复指出，我党区别于过去独裁者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他们特别心狠手辣，笃信“屠民治国论”。过往半世纪已经反复证明，中共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可以使出何等令人瞠目结舌的血腥手段来。因此，要武力推翻共党，第一后果必然是血流成河，造成无量的经济损失。胆敢否认这一点就是睁眼说瞎话。

早在４年前，我就郑重地请高寒先生给出人命和经济损失的预算，通告大众，他们到底准备付出牺牲多少亿人和多少亿美元的财产的倒共代价。奇怪的是，他除了辱骂我之外，从来没敢回答这问题。

我在这儿再次重复这问题，并郑重请所有在网上露面的“民运人士”包括胡平、魏京生、王希哲、徐水良、刘国凯、封从德、李洪宽、高寒等人提出自己的预算表来，并给出诸位有权代表人民作出这惨痛牺牲的决策的法理依据。谢谢！

２ｄ、推翻共党是一种事前可以精确计算、并在实施中得到严格控制的系统工程，绝不会像辛亥革命那样半道出错，不但没有达到原设计目的，反而使国家陷入长期动乱之中。

这种愚昧认定，我已经在２ａ中驳斥过了，因为缺乏及时接管的有力权威，共党骤然垮台只会导致无法无天的无政府局面。

要补充的是，世上变数最多、因而最难预知结局并加以严格控制的事件，就是人民革命。伟大领袖毛主席乃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权威、最有实力、意志最坚强的空前绝后的大独裁者，可就连他都无法控制文革，使得不仅延时之长远远超出了他“一年发动，二年进行，三年扫尾”的原设计，而且进程与结局与他的预期目的基本相反，最后不但弄出个林彪来，而且使得预定培养为革命接班人的青年一代成了反叛的一代。

因此，要使革命不逸出自己控制的轨道，必须厉行军人铁腕统治，这就是龟孙中山何以要提出“军政”那第一部曲。要做到这点，民运垃圾们就得把自己的政党改造为毛共式的黑社会组织，还得像毛共那样掌握一只绝对忠诚的党军，这样才能在推翻中共后立即对全国实行军管，等社会秩序恢复之后再逐渐还政于民。这在我看来就是唯一可行的策略。

但漫说伪民运没这本事，即使有，那又无非是重复中共的历史悲剧。早说过了，与其指望暴力革命筛选出来的

铁血强人恩赐民主，还不如指望被贪污腐败弱化了的旧统治者被动让步。因此，暴力革命的唯一意义是改朝换代，只能使一小撮野心家受益，非但不能解放人民，反倒使得他们连已有的自由都丧失了。

最后要说的是，即使民意测验表明，当代中国人民如３０、４０年代的人民一般愚蠢，误以为推翻了万恶共匪就有好日子过，那也不能算数，还必须通过严谨理性论证和预测。如果理性论证和预测提示推翻共党可能如同当年推翻国民党一般，使得人民陷入空前灾难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去抹杀良知，迎合愚民的肾上腺去制造灾难，就是对国家民族犯罪。如果诸位只是因为愚蠢犯下了这种罪行还可饶恕。如果诸位在上智如我者反复当头棒喝后还置若罔闻，那就是丧尽天良了。

Therefore，如果诸位不能驳倒我上面所作的严谨利弊分析，则诸位就此失去了任何以民主名义鼓吹推翻共党的道义资格，只配就此乖乖闭嘴——当然，那是说，如果诸位还残存几许知耻之心的话。

四、我党真正七寸所在

写完上节，不由得再一次沉浸在深沉的悲哀中，再度痛感中共革命使得国家民族倒退了有多远。毛共对全民作下的无可超越的大孽，就是它彻底败坏了全民道德与智力素质，使得今日中国的政治局面和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比起毛共上台前的４０年代来真是不可同世纪而语。

４０年代与我党那反动政治势力抗衡的，不仅有先进的开明政治势力国民党，还有更先进、更开明的青年党。此外还有所谓“第三势力”，也就是后来的民盟，那也是先进政治势力，只是因愚昧和野心上了中共贼船。正因为民盟是先进的政治势力，才在共党上台后受到了无情清算。

而今和我党那反动势力抗衡的政治势力，只有更反动的毛共余孽伪民运和更更更反动的邪教法轮功，前者不成气候，无非是一群热衷于意淫的无梁可跳的小丑，后者倒足堪忧。相比之下，现代中共本是反动势力，却让这些垃圾和超级垃圾，生生给对比成了相对的进步势力，变成了今日中国政坛上当仁不让的最进步势力。以致老芦这种最坚定的理性反共同志，也不得不本着“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被迫支持我党，反对它的政治敌人，又痛何如也！

这种空前的民族悲剧之所以发生，完全是因为我党全面控制了宣传教育，以其反动教义反复向人民洗脑，使得所有的“知识分子”的大脑都成了一片只长仙人掌的荒漠，从而制造出了中共反对派比中共更反动的荒唐政治局面。伪民运的头面人物无一不是“'民主’其外，毛共其中”的政治骗子。

这倒不是他们有意行骗，甚至也不是他们的过错，如同梦游症患者一般，they simply can't help it。早说过了：北极爱斯基摩人是绝无可能画出南半球的星空来的。在发射宇宙飞船前的几万年中，人类中最聪明的天才也无法想像出月亮那面是什么样来。

生活在毛中国那不见天日的文明黑洞中，连部美国电影都没看过，您让胡平、王希哲、徐水良、高寒那些大跃进炼出来的废钢铁又怎么可能知道西方民主是怎么运作的？后来虽然出了国，可惜又因年龄过大＋天资低下，始终过不了语言关，只能在臭味相投的几个华人中打滚，您让他们怎么去跟得天独厚的国内青年一代比？国内小青年如徐仰药、出尘看过的那些读物和录像，他们又上哪儿去看？

Naturally，废钢铁们的效法榜样当然只能是苏共和毛共的革命家，对施政的理解当然只能不是发红头文件，号召全民《紧急动员起来，强力制止江泽民称帝!》，便是写出《反对自由主义》、《犬儒主义——当代中国流行病》一类小册子来，僭妄地对人民进行思想改造；他们理解的“民主”当然只能是毛共的“人民当家作主”亦即“人

民民主”，而那“人民”当然绝不能包括反对他们的人；他们理解的“反对”当然就只能是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打倒”与“推翻”，而他们对待别人反对的方式当然也就是无情镇压。

这才是一切悲剧中之最可悲者，一个政权居然制造出整整几代令人瞠目结舌的心灵与智力的双重残废来，当真不能不令人作七日之哭！

悼词念完了，下面切入正题。

因为民运垃圾不成气，到现在他们也没能指出中共的死穴在哪里。这些年来我上网，自始至终只看见倒共阵营要弄一件法宝，那就是道德批判，从来只知道用民主制度道义上的优越性去“战胜”专制制度的辩护者。一旦遇到彻底否认道德存在的超级“犬儒”阿随，则他们的２０响立即卡壳，只能改为抓特务，再不行便“小便处长”、“Ｘ笔”等等“民主脏话”层出不穷，以“流氓民主”去弥补“毛共人民民主”之不足。智力难民营合全营之力，竟然拾掇不下一个“政治笔名”来，最后竟然出到篡改人家的帖子的超级下三滥招数。光这惊天动地的丑闻本身，便足以永久把倒共垃圾们钉死在网络史的耻辱桩上。

其实，中共最大的弊病还不在于道义上的不合理，而是它乃是一种天下最背时、最缺乏稳定性的专制制度。不是人民是中共的掘墓人，我党才是自己的掘墓人。

此中道理我已经反复说过无数次了，再吹一次轱辘笛吧。好在全中国除了轱辘笛之外，还从没谁有那眼力看出这最彰明较著的事来，所以，重复多次似乎也是应该的。

前文已经说过，民主制度的最大优点，乃是它具有缓和化解社会矛盾、和平解决社会危机的设计，而专制制度没有这设计，便只能使用高压手段压服。这结果是把社会矛盾存储下来，留到最后总爆发，闹得全社会玉石俱焚。此乃一切专制制度的通病，为旧式帝王制度和现代极权制度所共有。

但传统帝王制度有着一系列的设计上的合理优越性，现代极权制度拍马也追不着。因此，传统帝王制度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动辄就能维持几百年，共党极权制度则绝无此种好事，共党政权寿命再长也难熬过百年。这是由两者的建构方式区别决定的结果不同。

首先就是前文说的革命的软的那手。传统制度实行的是儒道释三教合一的道德洗脑。在此理论基础上设计的帝王制度有以下四条最主要的优点：

１、君王统治是“宇宙运行规律”。全民是皇帝的儿子，皇帝本人是上天的儿子。天子本人受命于天，代表老天爷治理万民。皇帝的权威来自于上天，只欠上天的情，只需感谢上天，而臣僚的权威来自于皇帝。前者与生俱来、不会因传代弱化，也不会因胡作非为自动丧失，后者则天生成了皇帝的债务人，全靠君王深恩才得以飞黄腾达，永远处于感恩图报的被动境地。

这条教义最重要的作用是，它使全民坚信：全国只有一人配作皇帝，那就是以性交方式传递天命的皇家直系子孙。换言之，天命就是开国君主的基因。凡是不携带皇帝基因者还要胆敢做梦，那就会遭到“天谴”，也就是“神人共殛”。无数民间说部和戏剧用佛家因果报应的方式，把儒家的这一教义牢牢地植入全民大脑，成了他们本能反射的一部分。看过《聊斋》的同志都该记得，据说直到清朝，死去千多年的曹阿瞒还在受冥报惩罚。

这结果是臣民以“畏天命、畏圣人言”的方式去敬畏上级特别是皇帝，彻底丧失了造反作乱的念头。大臣无论如何位高权重，也不敢稍存不轨之心。除非出现大规模乱世，使得臣民开始怀疑朝廷“气数已尽”，天命或已转移到别的接班人身上去时，皇帝便再传多少代，再胡闹顽劣如明武宗，再昏悖谬乱如明神宗，都具有与生俱来、无人胆敢怀疑、遑论挑战的绝对权威。除非是皇帝自动弃权，听任魏忠贤辈弄权，则绝无大权旁落之虞。即使是魏忠贤那种气焰薰天的权奸，崇祯上去没几天也就轻而易举地拿下了。

皇帝的这种绝对权威，从心理上杜绝了野心家们的窥伺，保证了统治的长期稳定性，使得皇帝不必时时担忧他人篡位，推行新政时不必担心下属造反，从而使明君具有整顿吏治或进行重大政治改革的天然实力，历史上的改革都是通过皇帝进行的。哪怕是王安石那种激进改革也不曾引起公开叛乱。如果不是老佛爷介入，则光绪推行的政治改革也绝不会流产。后来老佛爷自己的改革比光绪还激进，照样畅行无阻。

２、因此，传统专制制度是一种真正的独裁，也就是皇帝个人独裁，不是集团独裁。皇帝本人的地位和统治集团的其他成员例如丞相（或明清的首辅）有本质不同。皇帝的地位超越于整个统治集团，绝对不容置疑，不容挑战，不能解雇更不能砍头，而自宰相以下整个统治集团都没有这种特权，由此构成了"江流石不转"的政治结构，亦即"不变的皇家和流动的统治集团"。

３、它实行旨在牢笼知识分子的科举制度。前文已经说了，科举制度用费厄泼赖的方式，向每个有志者提供一种潜在的飞黄腾达机会。和欧洲封建社会不同，它不讲血统或地位歧视，除了皂隶倡优之外，对所有的平民开放，因而使得统治集团更加具有流动性。历史上有无数贫寒农家子弟藉此跃入统治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大饼轮流咬一嘴"的社会公平。"天命"论的反面震慑与科举制度的正面诱惑，使得在野野心家们循规蹈矩，按既有的必然渠道去实现自己的野心，从根本上消除了最有能量的在野反对派。

４、作为辅佐洗脑手段的道家和释家教义主张出世的消极无为哲学，唾弃富贵荣华和一切物质享受，因而为壮志未遂的野心家们提供了一种逃避现实、消除挫折感的最佳麻醉剂。这"出世哲学"与官方正面提倡的孔孟"入世哲学"相反相成，更加增加了社会的稳定度。

正因为此，古代中国根本不需要什么现代意义的国家机器，马克思说的"国家是阶级镇压机器"，在传统中国根本就不成立。除了外患严重的朝代，古代中国根本没有常备军，更无警察，监狱既小又简陋，一个县也就一个县太爷，三两文吏，几名捕快，哪有今天几百万共军、遍布各地的大小军区人武部、上百万武警、庞大的国安部、公安部、中宣部那些无比壮观的排场！

和现代专制者们比起来，古代君王真正实现了高枕无忧的理想境界，怪不得据说拿破仑要说，文人一枝鹅毛笔，如同２０万枝毛瑟枪，而田汉编写的京剧《西厢记》中崔莺莺要歌颂张生道："我爱他笔尖儿横扫千军"。的确，统治者没法不爱上老孔，他笔尖儿一扫，就把几百万常备军扫进"历史垃圾堆"里去了。

明白事理的同志至此应该看出，"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自从万恶的帝国主义打了进来，咱们便永远失去了传统生活方式。落后的中国文明被磅礴于全世界的西方先进文明推进了枯井里，卡在中间，成了"孤王半天吊"，民主民主不起来，独裁独裁不下去，端的是不良不娼。

对比上述传统帝王制度的优越性立刻就可以发现，我党每一条都缺如：

１、"天命论"。据说我党统治也是"宇宙运行规律"：无产阶级受命于天，授权共产党那先锋队作统治者。可惜，共产党一上台就必然要"走向反面"，再也不是无产阶级了，变成了阿随英明指出的"富人俱乐部"，从而自动失去了天命。毛时代还可以强装一阵子，但现代中共实行的赤裸裸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用我党的经典天命观来看，乃是逆天行事，正是新一轮共产革命的当然对象。

因此，和孔孟之道的功效完全相反，我党的"宇宙运行规律"专门和自己过不去。只要我党不扔掉马列毛主义这自杀利器，则我党对原教旨明目张胆的无耻背叛就永远是个潜在的七寸，邀请不得志的党内野心家去痛捏。这些人若想发难，最方便最义正词严的借口就是利用毛的"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号召人民起来打倒那货真价实的法西斯党、修正主义党。这些人可不比没有能量的工农大众，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但您若劝我党干脆扔掉马列毛主义，那岂不是让他们欺师灭祖，自动承认毛共乃是土匪，自己乃是匪徒余孽？

所以阿，现在我党面临的理论困境，当真是神仙也解不脱，连老芦这上智都想不出高招来，不能不令人无比同情。然而不解决这个问题，我党便永远如同“旧”社会中没有光明正大坐了花轿拜过天地，而是靠姘上老爷当了继室的来历不明的娼妇，永远上不得席，永远不能理直气壮地抬头面对乡亲，更无脸面对死去的太太娘家的人，永远缺乏执政权威。

２、最致命的还是，用“无产阶级代表天命”取代“皇帝代表天命”，就是用集团独裁取代个人独裁。

上面已经说过，传统社会中，在理论上，每个读书人都有机会成为宰相，但只有皇家基因携带者才有资格成为皇帝候补人。换言之，所有的官位都是 open 的，但皇帝的位子却是 close 的，由此造出了世世代代得到理论保证的个人独裁制度。但在现代专制社会中，每个党员在理论上都有资格问鼎最高统治权，党皇的位子和其他官位一样，乃是 open 的。此乃世上第一背时、第一愚蠢的独裁制度，由此生出了无穷弊端。

第一个弊病就是孙大圣质问如来的那句话：“他凭什么当玉皇大帝？”共党理论从没能解决这个问题，甚至没能在半世纪以上的执政实践中摸索出一条不成文法来，无论苏联还是中国都如此。不管是哪国共党的党章，都无法给出个作党魁的实在可行的标准来。这结果，便只能是用《天龙八部》上的星宿派方式，靠弱肉强食去决出党魁来。

当上党魁无非是靠两条：一曰“政绩”，二曰“实力”。前者证明自己的正确，而“正确”似乎也就是“天命”的代用品。老毛就是靠在夺权中显示出“正确”去从理论上击败竞争者们。这就是为何皇帝可以下“罪己诏”，共党领袖则万万不可：皇帝犯了错误，并不因此失去皇帝基因，而党魁犯了错误就再无资格代表“历史潮流”和“客观规律”。

但这条不过是官样文章，在共党内部，是“正确”还是“错误”，乃是由实力决定的——毛发动饿死几千万人的大跃进，还不是照样“一贯正确”？所以，最关键的还是实力，也就是控制人、特别是控制军队的能力。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话对我党内部来说确实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毛坐稳龙廷靠军队，斯大林则靠特务组织ＮＫＶＤ。离开这两个法宝，则两人根本就无法长治久安。

因此，共党领袖的权威只有一个真正来源，那就是实力。他们只能通过弱肉强食的流氓大赛决出头领来。这就使得共党永远处于持续内斗中，党皇本人毫无安全感，不能不把主要精力花在厚植人脉、防范政变上去，为此不惜一次又一次地发动先发制人的大清洗，在党内实施恐怖统治，这就是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施政特点。传统社会根本就无此必要，只有朱元璋那不懂孔孟之道妙处何在的文盲疯子，才会毫无必要地屠戮功臣。

但这种伤筋动骨的大清洗搞多了，必然把党搞得奄奄一息。因此，后继党魁必然要改用比较温和的清洗手段，但那天生的内在缺陷仍然在那儿，而且其严重后果与日俱增。

这问题我已经说了多次，就是“权威逐代递减律”。在中国那种大国，除非皇储从２０岁开始便有意培养全国性实力，否则在６０岁接位时必然是实力不足的虚君。但共党干部哪有这条件和胆子？如果小胡不是动心忍性装聋作哑，韬晦到了６０多岁，他早就给人家无情地掐了。但若没有实力作权威，即使当上党皇也是虚的。这样一代代传下去，权威逐代递减，等到后来就连个中央主席都决不出来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看出了这问题，于是效法帝王，搞出了“指定继承制”，以为他的指定可以代替实力作权威。他蠢到看不出来：今非昔比，皇帝可以指定太子，您老人家没那资格。皇帝指定的太子携带着别人没有的皇帝基因，所以建文帝只可能被明成祖那样具有同样资格的人颠覆。而在理论上，我党五千万党员统统携带“党皇基因”，都是“皇家子弟”，所以钦定皇储英明领袖华国锋被邓小平轻而易举地搞下去，连个死节忠臣方孝孺都没有。小胡之所以成功实现了“指定”的历史使命，有如说是靠老邓的身后权威，莫如说是靠老江的权威因传代而极大弱化了，无法阻挡他而已。

因此，现代极权制度实行的“集体领导”，乃是世上最凶险的专制体制。它将传统的“不变的皇家，流动的臣僚”改变成了“流动的党皇，难以流动的臣僚”，使得党皇成了大众觊觎的焦点，使得党成了个永动绞肉机，乃是最大的动乱温床，成了中国最不稳定的因素。

由此产生的现代极权制度的第二大弊病，就是上面已经提到的“难以流动的臣僚”。

如上所述，皇帝的权威来自于天，并不来自于臣民的拥戴，根本不需要培养什么私人势力。相反，臣僚的权威全靠皇帝恩赐，乃是皇帝的债务人，终身处于感激圣恩的被动地位。任何时候皇帝想撤回他的浩荡恩情都是他的自由，他想砍谁的脑袋都毫无问题。

现代专制制度则根本没这条。党皇的权威全靠实力，而所谓实力也就是各级掌握实权的干部的效忠。没有这些人效忠，则党皇立刻垮杆。

哪怕是老毛那种貌似拥有绝对权威的大独裁者，也不敢随便自断爪牙，文革再乱，他也不敢动那些军头如许世友等人，连斯大林的威风都没有。他为了搞掉刘少奇，不得不使出一系列流氓招数来（就连用共党那流氓党的眼光来看都是出格的流氓手段），肆无忌惮地践踏党纪国法，动用暴民，使得全国几乎陷入灭顶之灾。这种事若拿到传统社会去，皇帝要搞掉首相不过是闲话一句而已，哪怕是要废储也绝不会如此惊天动地。

后继的党皇就更是王小二过年了。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是谁怕谁？不光党臣怕党皇，党皇同样怕党臣，根本就不能如传统皇帝那样随便罢免任何一级官员。任何人只要进入干部队伍，除非卷入权力斗争中失败的那派，无论怎么作奸犯科都下不来。

由此便导致了第三个弊病，也就是现代独裁制度枉负独裁之名，却是内里瘫痪、中气虚弱的病夫。这倒真实现了伟大领袖说的“两重性”：对人民是铁老虎、钢老虎，成千成万地吃人，对党内则是吹口气就能倒的纸老虎、豆腐老虎。

因为党皇的权威来自于厚植人脉，党内便分裂成各种实力集团。党皇本人不过是这些实力集团之间角力后达成动态平衡的妥协结果。因此，这种杂烩党的专制效率只体现在利害一致之时。事涉镇压人民，则全党必定精诚团结，一致对外，令行禁止，雷厉风行，表现出独裁政体的高效率与无情铁腕来。但如果党魁提出的政策伤害到党内利益，则即使得到了政治局批准，也一定会被下面各级党组织的消极抵抗消解为无形。此时现代极权政体就完全是世上最软弱无能的政治制度。如西方法治国家那种法令一下，全国凛遵毋违的局面，在咱们伟大祖国便下辈子也没指望出现。

由此又派生出了第四个弊病，那就是党魁没有强制推行与党内实力集团利益相冲突的政治经济改革的能力。哪怕第一代铁血党魁都没这本事，毛的文革在老干部手下遭到惨败就是明证。老邓的经济改革之所以成功，完全是因为党官僚发现自己乃是最大的受益集团，没有抵抗而已。毛邓尚且如此，何况是乳臭未干的小胡？

由上派生的第五个弊病，则是共党彻底失去了整顿自身的自救能力。上面已经说过，共党官员和传统官员完全不同，周转率非常之低。哪怕是老毛，也要奉行“小节无害论”，以部下的忠诚作为唯一的“道德品质”，大搞招降纳叛、藏垢纳污那套，就连当过叛徒的张春桥，做过汉奸的陈永贵也加以重用，林副重用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那些色狼就更不用说了。贾庆林因为是老江死党，便犯了该杀头的贪污重罪也照样逍遥法外。

这种事在传统社会中根本就不会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全国都是皇帝的家当，全国臣民都是皇帝的儿子。在皇帝心目中，大臣远没有百姓重要。因此，大臣压榨百姓贪污受贿，就是偷盗皇产，就是破坏他爱民如子的明君形像，皇帝本人第一个就容不得，这才会有朱元璋将贪官剥皮实草的野蛮事。

党天下取代家天下之后，问题就来了。如阿随英明正确地指出的，如今咱们实行的乃是“普天之下，莫非党产”。

问题是，党产和皇产不同，它如同共产一般，产权没有明确到个人头上去。于是偷盗国家财产便如同当年工人偷盗厂产似的，谁偷到就是谁的，谁也没脸说谁，遑论法办谁谁。这结果，便是党皇根本不会如同传统帝王一样，对贪污犯罪感到心疼和气愤，从根本上就缺乏惩罚贪官污吏的感情动机，更没有惩罚他们的魄力——党臣不是党皇的儿子而是他的权力基础，他又怎敢自断爪牙，毅然自杀？

使这问题更加严重的是，皇帝从世袭改为轮流做之后，党皇就此失去了珍惜社稷，以便“子子孙孙永宝用”的守财奴心理，代之以短期行为。

过去的皇帝总想把江山永远传下去，如秦始皇那样指望传万世而不竭，起码要传一万四千年。继承的子孙也时时痛感祖先创业不易，生怕做了败家子，把偌大家私断送在自己手里，崇祯为此殚精竭虑，苦吃苦做到连性欲都丧失了。

党皇哪有这种心理？反正不是作一辈子，７０岁就要退休，此时不捞，更待何时？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敬爱的江总那聪明人就模范地实践了这一条。就算捞垮了党江山，那又便如何？反正不是我家的。我家后代早就送到美国去，在海外各大中文网站踊跃充当党卫军了。就算贫雇农在党内野心家率领下起来进行“二次革命”，那时我也早就死了，垮的又不是我的江山，我又何必心疼？

这综合结果，便是我党只会一天天烂下去，任何党皇哪怕有心，也都没有本事治理。

３、我党从未实行过传统社会那种公平的科举制度，也不可能实行。理由很简单，那就是它的整个权力体系是靠“叠罗汉”的方式层层叠起来的。每一级干部上面都有后台，下面都有死党。

这在传统社会根本就无法想象。在传统社会中虽然也有结党营私，但那不是遍及全社会的公开实践，在理论上为孔孟之道反对，在实践中为明君制止。上天就是皇帝的后台，他也不需要什么死党作为权力基础。但在现代专制社会中，从党皇本人开始就搞这套，小胡过去的后台是老邓和小超，死党则是“团派”。因此，这种靠私人效忠关系作“权力砖块”修起来的大厦，根本就不可能实行传统社会的科举制。

这结果，就是使得我党彻底成了私人派系的复杂关系网。和传统社会截然不同，我党干部不是靠君恩作朝廷的官，而是靠上司和部下当某个派系的官。这种烂污体制，在党魁权威经过多次传代弱化到一定程度后，必然导致四分五裂的政治藩镇割据状态。

４、传统社会的粘合软件儒道释已荡然无存。毛泽东强加给全民的禁欲主义已经被西方消费主义彻底扫荡。国内人欲横流，更比美国或任何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疯狂万倍。无限高涨的物质消费欲望只会造出越来越贪婪的贪官污吏，使得大众欲壑加深的速度超出国家财力的填补速度。这结果就是官僚机器的疯狂腐败和全社会不满心理日益加深。

综上所述，我对未来的预测就是，我党只会自己断送自己，不是被人民推翻，而是毁于内讧。用当年插队从老乡们那儿听来的民歌来说便是：“不是爹娘坑害你，你自搬石头自打脚！”这苦酒乃是我党自己酿下的，他们从执政那天起便已经上好了定时炸弹。

尽管我这辈子很可能看不到我党倒台了，但吾家小芦肯定能看到。我算定中共政权很难熬到１００岁，那计算方式很简单：现在中共领袖基本是每１０年传一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百岁时，还要在６０－７０的老头子们之间传上４代。中央权威根本就经不起这种呈指数曲线的稀释。等到中央权威稀释到了临界点，代之而起的就是军界强人崛起，最可能的前景就是国家分裂成若干片，民族地区统统独立出去。最坏的前途是陷入南斯拉夫式内战，最好的前途则是再度实行“东南互保”，使得独立了的“中华吴楚共和国”幸免战祸，为国家、民族与文明抢救下一片金瓯来。